

中图分类号: C23

# 抗战血泊中的一朵奇花

——谈谈“孩子剧团”的成长道路

廖超慧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生力军。①它在党的母亲般的抚育下成长壮大。在历时五年的时间里,孩子剧团行程一万六千余里,足迹遍布了苏、皖、豫、鄂、湘、桂、黔、川等八省区的五十七个县市。这一壮举,世所罕见,它为我国的抗战文学史,抗战戏剧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诞生在抗日烽火中

(1937年8月13日——1938年1月9日)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8月15日,上海戏剧界紧急动员,组成三个演剧队,宣传抗日。避难于上海沪西恩派亚戏院难民收容所的部分孩子也积极投身抗日洪流,自发地组织起来,教难童们唱歌,识字,还到医院慰劳伤员。孩子剧团的萌生期便由此发端。

他们的行动很快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和重视。8月下旬,王洞若等上海国难教育社地下党组织负责同志决定,以原上海杨树浦临青学校的学生为基础,吸收一些难童,成立一个儿童宣传组织。同时委派原临青学校党员教师吴新稼同志担任具体领导工作。9月3日,“孩子剧团”正式成立。

民族的巨大灾难,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抗战团体的锋起,是孩子剧团诞生的社会因素,而故土沦陷,校园被毁、流浪生活以及由此激起的特殊感情,是促使这些孩子奔向抗战第一线的内在原因。孩子剧团的成员最大的只有16岁,最小的年仅8岁。临青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开办的,1937年夏秋之季,在党的领导下,学校曾组织过一支歌咏队,经常利用课余和星期天在校外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临青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杨树浦的穷孩子,有的是从东北或江南流落到上海的。“八·一三”日机轰炸沪东,临青学校幸存的孩子们,站在倒塌的房前,面对着尸积如丘,血流成河的惨象,严酷战争使他们早熟了。

孩子剧团在党的怀抱里成长。从此,进入到形成期。剧团建立了最高领导机构——干事会,民主选举产生出干事会,其成员有:吴新稼、许立明、傅承谟、张宗元、张莺、罗真理

①慧琳:《孩子剧团欢迎会上》、《孩子剧团小史》,《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

等六人。吴新稼出任干事长（后改称团长）。干事会下设总部、剧务部、工作部和生活管理部，各部又设若干股，如生活管理部设健身股、伙食股、行李股等。他们还郑重地向社会发布了《孩子剧团宣言》，订立了“孩子剧团公约”，“生活秩序表”，建立了“值日生制”，并将团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五至六人，设小组长一人。定期召开生活会，检查卫生，督促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剧团宣传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增加了戏剧、双簧、演讲等项目，担负宣传一个收容所二百多名小朋友和一个小先生训练班的工作，除编印课本外，还负责六百多名儿童的歌咏工作，组织“儿童星期座谈会”，把上海十七个儿童团体团结在一起。更可喜的是，他们的脚步迈出了难民收容所，跨入到社会的广阔天地。孩子剧团的恩派亚戏院难民新舞台作第一次公演时，戏院老板百般刁难，最后竟将他们逐出门外。面对这意外的打击，孩子们没有灰心丧气，他们以战斗者的姿态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憋不死我们，走！到外面去演出！”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宣传点是上海八仙桥菜场，演出的是话剧《捉汉奸》，小演员纯真的感情，激起在场群众对汉奸卖国求荣的无比仇恨，甚至有人竟误将饰演汉奸的角色狠揍起来，可见演出反响的强烈。走向社会，使他们开拓了视野，密切了与群众的感情，增强了斗志，为在艰若的环境中经受磨炼打下了基础。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大批文艺工作者撤往内地。孩子剧团也多次向组织表示，要到前线去，到内地去。支持他们，让他们举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孩子剧团的旗帜，开始了新的历程。对他们的转移，组织上作了精心安排，给剧团增加了一名十八岁的党员林黎田担任领队，仔细地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转移路线，沿途还安排有党的同志接应，并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他们筹集了三百元旅费，剧团成员有的装成小商小贩，有的扮成学徒伙计，化整为零分五批奔赴当时的大后方武汉。在漫长的旅途中，二十多名乳气尚存的孩子，在敌人的烧杀抢掠之下、追捕搜查之中，好不容易到达一个预定地点，可是那里早已沦陷，他们不得不改变原定路线，长途跋涉，行程三千里，历时五十三天，途经南通、扬州、高邮、徐州、郑州等十三个县市，终于1938年1月10日胜利抵达武汉。他们不仅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饥饿、寒冷和疲劳，还抓紧了路途中的分分秒秒读书、练功、排练，坚持了走一路演一路的方针，即使吃不上饭，也不忘用歌咏、戏剧、唤起民众，激励自己。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激起过无数群众对侵华日军的无比仇恨，同时剧中的台词：“不苦，不苦，苦还在后面呢！”又成为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相互勉励的口头语。人们曾惊喜地称赞他们：“这一切载在神话和诗人们幻想中的情景，你们却用小小铁拳和钢铁般的两足，踏遍了祖国的半壁河山，进行着你们历史未曾有过的伟大使命。”<sup>①</sup>谁能说他们不象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小战士呢！谁能说他们不象征着中国抗战的胜利呢！是的，他们真正是“冲开了敌人炮灰的勇敢、天真、活泼的中国主人！”<sup>②</sup>

## 成 长 在 斗 争 的 风 浪 里

（1938年1月10日——1939年1月7日）

孩子剧团历尽艰辛，胜利地到达武汉，进入了生命的成熟期。

<sup>①</sup>许幸之：《给孩子剧团公开信》，《剧场艺术》二卷六、七期。

<sup>②</sup>茅盾：《记孩子剧团》，《少年先锋》一卷二期。

孩子剧团在抗日的风浪里茁壮成长，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注意。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等负责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给予他们以极大的关怀和保护。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则千方百计企图把这朵“奇花”摧毁。一场扶持与摧残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从上海到武汉长途行军的阅历，开拓了剧团成员的眼界，他们深切地感到，只有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而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已成为民族的罪人，从而坚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们一到武汉，团长吴新稼、领队林黎田在王洞若同志的介绍下立即赶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汇报转移中的情况，并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王洞若同志仍负责剧团党的工作，有重大问题可直接请示邓颖超同志。一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副刊以《大时代的孩子们——在苦难中成长起来》为题，连续三天用整版篇幅报道他们从上海到武汉神话般的奇迹，同时刊发了《孩子剧团宣言》和《孩子剧团之歌》。社会知名人士茅盾、楼适夷、张劲夫、史良和一些救亡团体，中、小学学校代表，《新华日报》、《大公报》记者先后到剧团慰问，还作了现场采访。党还特地在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剧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周恩来、叶剑英、博古、邓颖超、叶挺、王明、潘汉年、孟庆树出席了欢迎会，会上周恩来和郭沫若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可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拼命污蔑孩子剧团，公开咒骂剧团成员“只是些耍猴戏的娃娃”。同时还阴谋策划解散孩子剧团。早在剧团到达武汉前，郑州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秘密与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密谋进行收编。当剧团得知这一情报后，全体成员团结在干事会周围，迅速与先期到汉的王洞若同志联系，并制定了团内纪律。一到武汉，党就派人将他们顺利地接出车站。由于全体成员紧紧依靠党，团结一致，机智勇敢，很快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收编阴谋。然而，风浪并未平息。在到汉后的一个多月中，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曾多次诱逼他们搬进市党部去，孩子们敏锐地觉察到敌人的险恶居心，一向邓颖超同志作了汇报。邓颖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要“把他们关起来”，她斩钉截铁地说：“绝不能去，推辞他”。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妄图以既成事实的手段扼杀孩子剧团。1938年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国民党市党部秘书对吴新稼威胁说：“市党部开了会，决定把你们收编到市党部去。明天早晨八点钟派车来接你们，准备好，不要耽误了！”形势急迫，干事会及时去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当晚十二时许周恩来同志办事回来，决定让他们暂避黄石。孩子们乘上五点半开往黄石的轮船，逃离了虎口。周恩来、郭沫若等为了保护孩子剧团，一直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着斗争，终于争取到将孩子剧团编为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第一科。

在周恩来同志和长江局领导下，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吴新稼任支部书记，党员从两名发展到九名。全团定编六十人，由三厅发给生活费和工作费，由第六处处长田汉，第一科科长洪琛直接领导，陈乃昌任指导员，负责文化学习。聘请常任侠同志担任语文教员，曹荻秋同志教授英语，还特约徐特立同志作“学习方法与态度”的演讲。1938年4月，孩子剧团进驻第三厅所在地武昌县华林，在那里与十个演剧队、四个宣传队和一个漫画宣传队集中训练。由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亲自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郭沫若、田汉、石凌鹤、马彦祥、石云卫等讲授戏剧理论，戏剧常识等课程。为适应战时生活，还进行了军事训练。集训期间，团员们运用学得的理论知识编排节目，参加汇演。

孩子剧团运用文艺宣传这一武器紧密配合形势，始终坚持抗日民主的大方向，以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实现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动员民众反侵略战争为目的，他们表演的节目内容

也日益丰富，形式更加多采多姿。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纪念上海人民“一·二八”英勇抗战六周年时，孩子剧团积极参加演出；配合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他们公演了精采节目；在送戏进厂、送戏下乡、送戏到前线的各种宣传中，孩子剧团也从不肯落后一步。他们到汉阳兵工厂上演抗敌宣传节目；为筹款救济武昌裕华纱厂失业工人义演；为激发广大农民的抗日热情举行联合公演。特别是在汉口中华影院为负伤将士表演的《歌八百壮士》，激发起千万抗日官兵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坚守武汉的决心，而在汉口孙中山先生铜像前，他们那《保卫大武汉》的儿童大合唱，情真意切，感染了广大观众。他们还贴墙报，办副刊，现身说法宣传抢救儿童的意义，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到处有他们矫健的身影，在抗战的大舞台上，充分显示出轻骑兵的巨大战斗力量。

孩子们常说：“我们并不是为演戏而来，而是为了救国，为了讨论我们小朋友应该怎样来救国的”。<sup>①</sup>他们认为大人们有了组织，儿童也应该有自己的组织。他们认为演出不仅仅是宣传群众、唤起群众抗战意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演出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抗日目的传播到群众那里去，进而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结成一支出声势浩大的抗日大军，去击溃日寇的侵略。在武汉、衡山一带，孩子剧团播下了抗日的种子，结下了累累硕果，儿童救亡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开封扶轮小学的孩子，在“在阅览室里看见了上海孩子剧团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介绍”后，于1938年3月8日成立了开封孩子剧团，活跃在中原大地上。<sup>②</sup>武汉的儿童救亡组织更是不断兴起，异常活跃。在保卫大武汉、抢救儿童的活动中，孩子剧团敏锐地感受到，只有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才能有效地开展活动。于是他们发出武汉儿童救亡团体联合起来的号召，十二个武汉儿童团体很快联合起来，成立了武汉儿童工作队。工作队设立了宣传、总务、出版和联络四个部，聘请田汉、安娥、史良等担任指导。确定“儿童星期座谈会”为工作队每周例会，以交换工作、讨论工作方法、报告工作经验，推动儿童救亡工作的发展。工作队成绩斐然，成为保卫大武汉战斗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当年的新兴横街广场上，以生动的表演鼓动起“千百个拳头象桅杆般举起来”，发出“我们要组织起来，保卫大武汉”的誓言。不到半月，他们写出了上千封热情洋溢的慰劳信，举行了多次军民联欢会，致使抗日将士们被他们的歌声、话剧“感动得流出许多眼泪，燃烧起旺盛的热情”。儿童工作队晚间演出居多，白天他们组织儿童反侵略大游行，为募捐寒衣开展儿童报献金活动。他们炽热的爱国行动，赢得不少家长的信赖，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工作队和保育会。广大儿童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入抗日救亡宣传队的行列。

武汉沦陷前夕，孩子剧团先行撤退到湖南衡山，在那里，他们除坚持公演外，还借当地的两种日报办了《衡山儿童周刊》和《孩子剧团周刊》，介绍孩子剧团的工作，讨论和研究衡山儿童问题并影响邻近各县儿童工作。趁校对“周刊”之便，他们把抗日歌曲、戏剧带进排字房，激发起工友的抗日热情。衡山儿童纷纷要求参加他们的剧团。由于经费困难，孩子剧团采取寄居的办法扩大组织，即生活由家长负担，学习、工作、教育享受正式团员的待遇。孩子剧团的事迹飘洋过海，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刊发表了报道和评论，苏联基辅先锋队寄来了贺信，巴黎陆瑾女士寄来了捐款。

<sup>①</sup>张莺等《我们是怎样到武汉的》，《新华日报》1938年1月24日。

<sup>②</sup>刘玉柱：《活跃在中原上的开封孩子剧团》。《新华日报》1938年9月24日。

在党的精心培养下，孩子剧团在演出的形式和技巧上也大有长进。他们既考虑到抗战文艺作品需要短小精悍、富有鼓动性的特点，又注意了它在演出中容易出现单调、松懈、衔接不紧的毛病，因此着意提高安排节目的技巧，采取不同形式的节目穿插演出。以歌咏和戏剧为主，同时穿插舞蹈、快报、演讲等形式。这样，既调节了观众的情绪，使人感到节目紧凑、活泼，保持演出场地的热烈气氛；又便于各种层次的观众理解节目内容，达到宣传群众的目的。孩子剧团创造性地运用大众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有着鲜明的特色，他们不愧为大众文艺的天然拥护者，忠实实践者和勇敢的创造者。

在武汉及其衡山等地的一年是孩子剧团发展的成熟期。他们在暴风雨中搏斗，以强烈的爱憎，顽强的斗志，大胆的探索和纯熟的技艺显示出他们的日趋成熟，实现了周恩来同志期望他们做到的“救国、革命、创造”。象火种一般，点燃了广大民众心中的抗日烈焰。人们欣喜地看到，在“这伟大的新时代”，“创造出了最聪明、最优秀的儿童”，赞扬他们是在完成“实际拿起枪杆子，在民族解放的战场，承担起捍卫国土，收复失地的伟大使命”<sup>①</sup>。

## 前进在泥泞的道路上

(1939年1月8日——1942年9月)

孩子剧团在衡山短暂停留，随即辗转于长沙、桂林、贵阳、遵义等地，于1939年1月8日抵达重庆。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强迫改组第三厅，令孩子剧团全体成员加入三清团。孩子们在郭沫若同志的领导下，采取拖延、应付的办法，与国民党对抗。1940年秋，国民党当局又下令将孩子剧团编入重庆卫戍司令部政治部。“要同敌人斗争！”孩子们从周恩来同志住处，曾家岩50号得到明确指示：决不能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应尽量运用社会上的一切力量，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力量进行斗争。遵照党的指示，他们先后找中苏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孙科，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交涉，但事情未得到解决。最后通过团员翟文清的关系，与冯玉祥先生取得了联系。在冯玉祥先生的帮助下，孩子剧团才算暂免收编。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孩子剧团救亡工作的限制，阻挠却变得更加利害。在涪陵，国民党派宪兵队排长监视孩子剧团，致使儿童工作座谈会和观看演出的人数越来越少。剧团面对这险恶的形势，派出与那个排长同乡的团员赖珏与之周旋，故意透露假演出地点和时间，使之扑空，以保证演出的胜利。在江津、峨嵋等县，反动派用控制剧场、禁止举办抗日丛书展览，拒不代发戏票等手段和以“新兵没有知识，蛮得很，出了事不好办”为借口，千方百计破坏孩子剧团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但这一切，怎能使觉悟了的孩子们屈服呢？他们一面义正词严地揭露敌人的阴险，一面机智勇敢地进行抗日宣传。在泸县，孩子剧团成功地组织了别开生面的火炬游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9年，泸县地区国民党在泸州公园举行所谓各界纪念大会，借纪念抗敌两周年之名，行反共宣传之实。嚣张的反革命行动，激起孩子们的极大愤怒。在队委会的支持下，孩子们分头联系小市兵工厂的工人、第七保育院的儿童以及小学师生举行火

<sup>①</sup>季仁。《回忆武汉劳动童子军》，《新华日报》1938年4月18日。

把游行。当晚，爱智小学的鼓号队率先出发，游行者高举火把，一边唱歌，一边高呼“纪念抗战两周年，军民合作，抗战到底”！“打倒卖国大汉奸汪精卫！”“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的口号，大街小巷的群众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险恶目的。孩子们还到监狱中，用歌声燃起“囚犯”对敌人的仇恨。他们深入国民党的中央军校、航空学校、兵营，以他们诚挚的感情唤起官兵的抗日热情。严酷的斗争生活，把孩子们锻炼得勇敢机智、爱憎分明。

政治形势的逆转，国统区文艺创作的特点与抗战初期大有不同。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行，鼓舞人民的斗志，文艺工作者广泛采用历史剧、讽刺剧等形式进行斗争。孩子剧团在重庆也以演剧为主要斗争手段。他们上演了石凌鹤先生根据孩子剧团的战斗经历创作的《乐园进行曲》，剧本前四幕写孩子剧团的成长经历，实际就是揭露国民党的投降嘴脸。这个剧反响强烈，连演不衰，轰动了山城，吓得国民党反动派只好撕下伪装，发出禁演令。但孩子们不避险恶，不怕打击迫害，仍然坚持上演。团员张莺将张天翼的童话故事《秃秃大王》改编成儿童讽刺剧。蒋介石是光头，住在上清宫；而剧中的秃秃大王也是个秃头，又正好住在上清宫。为使此剧顺利上演，孩子们巧妙地将“秃秃大王”改为“猴儿大王”，将“上清宫”改为“万福宫”。令查禁大员无可奈何。演出同时，孩子们还特地在说明书上添上了十六个大字：“猴狼猪狗丑态毕现，魔鬼怪物恶象齐全”。观众对此心领神会，十分欣赏，一时间“秃秃斗秃秃”的笑话传遍了山城，演出盛况空前。在抗战文艺大军中，孩子剧团是一个机警的小兵，冲锋在前，无所畏惧；在抗战文艺的大合唱中，又是一个强音，总是那样合拍而又响亮，显示出与整个抗战曲调的谐调美。

1941年下半年，国民党对孩子剧团的控制和迫害愈加严重。三青团干事李清灿调任孩子剧团的“指导员”。1942年9月，又撤换剧团原来的全体干部，改派三青团骨干分子和中央政治学校教官接管，改任李清灿为团长。孩子剧团的正常生活和活动受到特务的监视，天天都有化装特务窜到孩子们的驻地，随意搜查，孩子们无法忍受这种践踏民主、侵犯人权的黑暗世道，他们多么渴望明朗天空下的自由生活啊！“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坚决要求到延安去。为了执行党在国统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周恩来同志指示把孩子剧团的骨干和大部团员撤离出来，孩子们终于挣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和压迫，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至此，孩子剧团走完了它五年多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剧团成员有的转移到郭老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有的进入国立戏剧学校和国立音乐专门学校学习，有的奔赴到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到了广东、昆明。他们以战斗的英姿继续活跃在广表的祖国大地上。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将永远载入抗战文艺的史册。